

新大众文艺现象及意义研究

中国作协创研部
文艺报

·合办·

跨媒介写作与新人文趋向

□刘大光

◆新时代跨媒介融合让文学重新成为一种“杂文学”“大文学”与“泛文学”，带来了从主题到风格、从技术到审美的全面革命。这是一种新的大众的文艺，让文学回归了与生活之间的密切关联，即它不再是个体化的、精英化的、形式具有严格规定性的“纯文学”，而走向了或者更恰切地说回到了原初那种同生活情境、质感经验和真切感受紧密相关的自然表达。

◆当代人需要在算法丛林中守护那些不可被计算的震颤：深夜想起故人时突如其来的泪流满面，在路上时的某个似曾相识的词语忽然跃入脑海，那些让屏幕前的我们突然离开键盘、放下手机、望向窗外的微妙瞬间。这些时刻，是无论何种技术都无法生成的切身感受，是文学和艺术得以继续存在的证明。

我们身处在一个媒介融合与文化融合的时代，现代以来分化为各个具体学科的内容正在迎来新一轮的调配与整合。这种变革由科技的日常生活化启动，波及到文学的方方面面：主体上的全民参与，创作上的即时交互，传播上的移动普及，阅读上的视频转向。一个新大众文艺时代已经降临。

跨媒介写作带来的诸多变革

当TikTok用户用15秒短视频重构《红楼梦》的人物关系，ChatGPT以每秒五千字的速度生成网络小说，《三体》动画在B站引发百万条的弹幕互动……媒介技术对原先文学场的“解域化”进程已势不可挡。这场变革的本质是媒介物质性对文学生产关系的重塑，其冲击波正在颠覆自古登堡革命以来建立的整个文学认知体系。

媒介融合推动了文学作品从单一的文字形式向文字、声音、图像、视频等多模态的转变，让影音图文的“泛文学”成为时代文艺的主流。这一切看似新颖，实则早已有迹可循，媒介考古学显示了一条从身体展演到算法生成的演进路径。

在川滇彝族的“克智”口头论辩传统中，诗歌即兴创作，伴随着酒器传递、肢体韵律与火塘烟雾，共同构成了意义的场域；敦煌中的变文写本，残留着从讲唱到书写的过渡痕迹，插图与韵文交织的形态，暗示了历史长河中因应技术条件变化而层出不穷的跨媒介实践……它们共同印证了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的论断——文学从未局限于纯文字形态，其本质是特定媒介环境中采用不同媒介工具的意义编织术。数字时代的特殊性在于：算法不仅改变了创作工具（如AI辅助写作软件“彩云小梦”），更重构了文学生产机制。阅文集团开发的“黄金三章”写作模板，通过大数据分析网文爆款结构，将叙事节奏精确到每500字就有一个情绪刺激点；晋江文学城的热门标签推荐系统，本质上是用机器学习解构人类情感模式。当写作从心灵独白转为数据喂养，文学正在经历本雅明所说的“灵韵”消逝后的又一次祛魅。

■书评

随着城市化的进程日益加速，当代城市文学与文化的研究蔚为大观。受此激发和影响，有关古代城市文学的研究，于近些年渐成热点。城市（城邦、城邑）的成型和功能，成为国际学术界公认的早期人类社会“文明”（与蒙昧、野蛮相对应）的标志之一。中国古代典籍，有关城市（城邦）的记载，其来有自。《韩非子·爱臣》中的“大臣之禄虽大，不得威城市”，为典籍中较早出现的“城市”称谓。对于城市的记载，经历了从历史叙事到文学表现的演进。就文体而言，传统的文、诗、词、曲、赋、小说、戏曲，都有对城市的典型表达。其中，小说与城市的关系最为密切。小说缘城而起，因市而兴，城市民众的思想和情感以及审美娱乐，多借小说而表达。小说可谓是城市叙事文学最具代表性的文体。

浙江师范大学葛永海教授致力于古典形态的城市文学研究多年。近年出版的《中国城市叙事的古典传统及其现代变革研究》，是他这些年深耕细作的结果。该书聚焦的“城市叙事”，意指“发生在城市空间中、带有城市属性的故事情节的叙事内容或段落”，以与“城市文学”“城市书写”相区别。该书以中国城市叙事的“历史演进”“传统特征”与“现代转型”为三大核心论题，着重于探讨城市叙事的动态历史。

具体说来，该书在研究中展现出三个鲜明的特点和价值。

一是对历史演进的正本清源。当下的城市

跨媒介写作带来了多模态叙事的范式革命。腾讯动漫出品的《一人之下》IP开发路径，典型展现了跨媒介叙事的商业逻辑：漫画原作→动画番剧→手游→虚拟偶像演唱会→线下主题餐饮，每个端口都承载着差异化的叙事碎片。这种“新宇宙化”叙事不再追求经典文学的封闭结构，而是通过用户在不同媒介间的游走来建构意义拼图。更具颠覆性的是交互式影视，《黑镜：潘达斯奈基》让观众通过选择按钮决定剧情走向，中国互动剧《隐形守护者》则融合真人拍摄与游戏化分支叙事。当“读者”进化为“玩家”，罗兰·巴特“作者之死”的预言获得了技术加持的终极实现形式，并且实现了它们彼此之间合体的重生——创作、传播、消费联结为了一种共时性的实践。

但是，令人文知识分子忧心忡忡的是算法牢笼。今日头条的推荐算法曾创造人均日刷127分钟的内容沉迷奇迹。就我个人而言，每日花在抖音和小红书上的时间也超过3个小时，这必然导致“信息茧房”的效应。在文学领域，番茄小说的“智能分章”系统通过阅读速度、暂停频率等数据实时调整章节断点，这种“神经叙事学”将读者生理反应纳入创作闭环。值得警惕的是，当某网络机构引入AI审核系统自动屏蔽敏感词时，技术正在成为新型文学规训工具。不过，Z世代创作者也在开发反算法策略：豆瓣小组“糊弄学写作指南”传授如何在AI审查中植入隐喻，B站UP主用“鬼畜”视频解构经典文本，这些实践印证了德勒兹“逃逸线”理论在数字时代的适用性。

人文观念面临的新挑战

新时代跨媒介融合让文学重新成为一种“杂文学”“大文学”与“泛文学”，带来了从主题到风格、从技术到审美的全面革命，其内在底质隐含着新人文的趋向，预示着人文主义的根本性转型已经到来。这是一种新的大众的文艺，让文学回归了与生活之间的密切关联，即它不再是个体化的、精英化的、形式具有严格规定性

的“纯文学”，而走向了或者更恰切地说回到了原初那种同生活情境、质感经验和真切感受紧密相关的自然表达。

需要注意的是，技术民主化并不必然带来人文观念的民主化。快手平台上“打工诗人”现象值得关注：建筑工人邵霞用手机记录《吊带裙》诗诗获百万播放，其粗糙的现场录音与晃动的工地影像，反而构成了对精致化诗歌美学的挑战。这种平民美学的兴起，呼应了威廉斯“文化是平常”的理论主张。但技术平权表象下，新的差异性正在形成：上海作协推出“元宇宙作家驻留计划”的时候，青海的基层写作者仍在为4G网络稳定性发愁。更隐蔽的危机来自数据殖民主义——某知名网文平台用户协议显示，作者创作的所有文字、世界观设定均归属平台方，这种“数字佃农”制度正在全球内容平台蔓延。

肉身经验也具有不可通约性。脑机接口公司Neuralink的实验猴能用意念玩“乒乓游戏”，元宇宙社交平台VRChat中数字化身已能模拟触觉反馈。这些技术似乎正在印证唐娜·哈拉维的赛博格宣言，但肉身性在此显现出抵抗价值：余秀华诗歌中震颤的肢体语言、双雪涛小说里东北下岗工人手指间的卷烟气息、魏思孝笔下那些城乡结合部的零余人酒后的互殴与沮丧……这些具身化经验难以被数据化转译。即便是最先进的AI写作系统，也无法复现史铁生在地坛公园轮椅上的沉思轨迹——那些青苔蔓延的砖缝与忽远忽近的鸽哨声，构成了文学灵韵引以为傲的壁垒。旅途中的偶然性遭遇、生活中溢出于常规之外的奇妙感受、悲欣交集的矛盾心理、踌躇惆怅的瞬间……生活世界的含混、暧昧、流动、偶然、不确定性，是属于人的文学的魅力和意义之所在。

在已存的尝试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新人文主义的中国探索。杭州“宋城千古情”景区，全息投影技术再现《清明上河图》的市井烟火；故宫博物院推出的《谜宫·如意琳琅图籍》，将古籍考据转化为实体解谜游戏。这些实践暗合中国传统美学的“通感”思维：王维“诗中有画”，杜甫“晨钟云外湿”中听觉与触觉融合的跨媒介传统，在数字

城市叙事的古代溯源和当代启迪

□普慧

叙事研究，多集中于现当代文学领域，存在较大的空白地带，缺乏历时性、整体性和系统性。当代研究者多局限于上世纪90年代的“新生代”都市小说，现代城市叙事研究则多集中于海派小说，至多到近代的《海上花列传》，而历时的城市叙事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即忽略了城市叙事的连贯性，缺少“沿波讨源”或“寻根振叶”的“源流”视野，因而未能建立起城市叙事的整体观、系统观和辩证观，难以形成相应的理论建构。

该书系统梳理了中国城市叙事的演进脉络，将《诗经》时代一直到20世纪初的城市叙事，划分为宋前的“都城圣咏”、宋元的“市井俗调”、明清的“城镇和声”、近代的“都市变奏”四个阶段，凝练出这一漫长过程中所汇聚的各种声部、交织着的各种风格而产生的恢宏交响，深刻揭示不同阶段的主要特征，切中肯綮。

就本质而言，城市叙事属于空间叙事，城市空间的如何变化，直接决定着叙事特性的形成。该书区分城市的空间形态为4种类型：（1）先秦至唐代的“单质型空间叙事”。这种空间属性比较单一，缺乏空间的延伸感，空间属性基本从属于叙事的政治性和历史性。（2）宋代至清中叶的“交互型空间叙事”。其特点是城市空间中呈现多层次、复合性、彼此交错的特点，以城市的世俗性、商业性、地域性为中心。（3）清晚期至近现代的“感悟型空间叙事”。其特点是空间层次丰富，出现了较为自如的空间转换甚至跳跃，以城市的

现代性为中心。（4）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重塑型空间叙事”。其特点是许多传统主题尽管不断被赋予时代内涵，城市叙事的中心主题不再占据主导地位，而是呈现出去中心化和多点、多边化。

二是城市叙事的理论自觉。该书有意识地熔文学与城市学于一炉，不流于表面现象，而是在中西方的文学叙事理论和西方的城市学理论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衍伸，形成理论上的高度自觉。

一方面，该书注重对于中西方叙事学理论资源的积极借鉴、汲取。例如，作者对于“城市叙事”的内涵诠释，即融摄中西方理论的视角。作者认为，城市叙事包括这么几种情形：一是作为情节背景的存在，如唐传奇《李娃传》等中的长安叙事，城市是故事的发生地和背景；二是作为叙事结构的存在，如宋元话本《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的杭州叙事，城市作为文本的一个结构性因素，与人物之间形成了互动性效果；三是作为一个文化想象的存在，如章回小说《红楼梦》中的金陵叙事，城市在文本中已经超越了一个地域化的表象，具有广泛的辐射性和象征性。

在具体的理论观照中，该书强调了中国传统的城市叙事的多样性，如汉唐间的都城叙事，展开的方式不尽相同，但其中的“都”“国”同构的心理图式是坚韧而一贯的，它是政治理念、民众心理、时代精神与国家意识相统一的

时代获得了新技术表达方式。更值得关注的是网络文学中的东方玄学转向，《道诡异仙》等作品将周易卦象、丹道修炼与现代科幻融合，创造出不同于西方赛博朋克的另类想象。新近大火的《哪吒之魔童闹海》更是将古老的神话、考古的实物、古典的纹饰融入重写的神话特色的超级英雄叙事之中。这种文化自觉，为突破技术人文主义的西方中心叙事提供了可能。

反思数字时代新人文的走向

上述这一切，促使我们反思数字时代新人文的走向。毫无疑问，引发最多讨论的是平台资本结构性暴力问题。其内在的原因在技术掌握在何种主体手中，是普惠大众，还是被少数资本所控制？当起点中文网用“章节订阅+打赏分成”模式重构作家收益结构时，网络文学的生产关系已发生本质改变。头部作家会占据绝大部分流量，但也并不能带来他（她）自身的解放。头部网文作家也被迫要日更，而平均更新量能达到1.2万字，这实际上是以时间与精力来置换收益，显然这会催生新型的压榨模式和职业伤病。更严峻的是算法剥削，很多平台签约作者都需根据热度指数实时调整情节走向，其创作自主性让位于数据绩效。这些现象要求必须将媒介政治经济学纳入分析视野，揭示“自由创作”表象下的数字劳动异化。

另外一个问题是我在《从后文学到新人文》中提到的多重现实的后果，虚拟现实会带来认识论和主体性的挑战。在《原神》游戏中，全球玩家通过“钟离”角色共同建构起跨文化英雄想象；二次元虚拟歌姬洛天依的演唱会，实现了十万观众同步全息互动——虚拟具身化已经照进了现实，并且生发出巨大的能量。当“00后”读者在AO3同人站为虚拟角色撰写“救赎文学”时，其情感投入的真实性是否需要新的阐释框架？在人与非人行动者共生的文学场域中，传统的作者/读者二元论正在失效，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主体间性”的定义。

对新兴的数字人文主义怀抱热忱的乐观主义者，也要面临一个在地化的困境。非洲作家恩古齐·瓦·提安哥倡导的去殖民化想象，在遭遇Kindle全球出版体系时面临新的文化驯化风险。反观中国网络文学出海现象，起点国际（WebNovel）上《诡秘之主》的英译本获得西方读者追捧，但其修仙、洪荒体系的文化转译过程充满了损耗。翻译中的变形与扭曲本是常态，但这个例子也提醒了一点，那就是跨媒介叙事全球流动中，如何避免技术普遍主义对地方性知识的碾压，将成为新人文主义建设的关键命题。

新技术浪潮席卷而来，并将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裹挟进去的时候，我们应该明了，在经验变革的“未来已来”时，还有着文化稳定性的“过去未去”，尤其是文学这一人类心理、情感与精神性生活的形式，有着厚重而坚实的传统积淀，构成了文化本身的形式。即便在赛博格的语境中，也依然不仅仅是某种怀旧式的过往，而是发生着的现实，过去还会在未来重现。

这是新大众文艺的一个侧面，也证明参差多样的多元共生才是文学活力的源泉。从良渚玉琮上的刻画符号到敦煌卷子中的朱笔批注，从宋代勾栏瓦舍的说书场到抖音直播间的连麦创作，中国文学始终在媒介变革中寻找存续之道。我认为新人文的趋向，本质上是在数字混沌中重建经验与诗性的家园的努力。深圳“城中村文学计划”用AR技术将打工诗歌投射于拆迁废墟，故宫《石渠宝笈》绘画数字展让观众伸手触碰千里江山图的笔墨肌理，技术与人性在其中达成了良性而美好的和谐。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怀念灵韵，当代人亦需在算法丛林中守护那些不可被计算的震颤：深夜想起故人时突如其来的泪流满面，在路上时的某个似曾相识的词语忽然跃入脑海，那些让屏幕前的我们突然离开键盘、放下手机、望向窗外的微妙瞬间。这些时刻，是无论何种技术都无法生成的切身感受，是文学和艺术得以继续存在的证明。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必然产物。由此，凸显了城市叙事的中西差异。18世纪以来西方文学中的城市叙事所经历的一种线性演进，即“从田园牧歌式（如城乡对立）到现实主义（如阶级斗争）再到现代主义（如审美沉思）的历史发展”。而中国现代城市叙事将西方前后相继的历时性的发展阶段，神奇地转换为并置铺展的共时性发展，构成了中国城市叙事在完成现代转型时的真实场景。凡此种种，体现了该书开阔的学术视野和多维的理论视角。

另一方面，该书尽可能汲取西方城市学、地理学中的各种思想资源。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书中借鉴了美国地理学家段义孚提出的著名术语“topophilia”（恋地情结）——一种对于家乡（生长地或生存地）眷恋和尊重的情感，衍伸为城市社会地理学中的“地方感”。这种情结表现为对身处环境的情感依附，是个体在精神、情绪和认知上维系于某地的纽带。中国文学作品所蕴含的黍离之悲、遗民之叹，都属于这一情结的具体表现。“恋地的本质是留恋生命、场所、地方或地域特征则是生命的载体和象征，为生命的留恋提供了空间，为易变的时间提供了不变的空间，为不可用的时间提供了可用的空间替代。”书中围绕中西方学说展开的理论思辨为该书增添了更多的理性哲思。

三是古今转型的现实关切。城市叙事的古今转型是该书的重点内容之一。城市叙事内容

的古今转型，包含了历史民俗、日常体验、工商贸易、都市情调等四种题材的演变。此外，叙事系统的新变，包括了故事场景与人物、城市故事主题、城市故事写法以及城市情感的变化。到了20世纪30年代，新感觉派小说崛起于文坛。城市的现代性、描写的空间化和城市反省等叙事要素得以确立，标志着城市叙事的现代转型基本完成。

这种古今之思，最终表现为古为今鉴，也就是对于现实的启发意义。该书概括的这种历史启示为：家国情怀之题旨，地域文化之意蕴，价值冲突之形式。就是说，小说家唯有怀抱热烈的家国情怀，感悟深刻的地域文化底蕴，充分展示城市生活中关于时代、文化、人性的冲突，才能创造出城市叙事的杰作。

历时性地探究中国城市叙事的演变规律与理论特征，不难发现，当代城市文学创作中的诸多命题都有其历史的渊源，如宋元至明清的商贸叙事对于近现代商贸叙事的影响，再如宋元民俗叙事到当代城市民俗叙事的传承演变，还有城乡对立观念在明清小说中的多种表现形态，等等。这些发掘表明，城市叙事的历史如同滔滔长河，绵绵不绝，前后相继。那些曾经遗落在岁月烟尘中的典范文本，一经发掘，其思想因子和文学技巧，皆可为当代城市文学创作和研究提供丰富的文化滋养和充分的艺术借鉴。

（作者为浙江师范大学教授）